

TOP FINANCE PROFESSORS IN CHINA

中国金融博导

梁伯枢 / 刘彪 / 等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为本书题写书名

中國金融博导

戴相龍



责任编辑:毛春明
责任校对:潘 洁
责任印制:裴 刚
封面设计:林胜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金融博导/梁伯枢等著.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4

ISBN 7-5049-1958-6

I. 中…

II. 梁…

III. 金融—专业—博士—教师—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0613 号

出版 **中国金融出版社**

发行

社址 北京广安门外小红庙南里 3 号

邮码 100055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25

字数 447 千

版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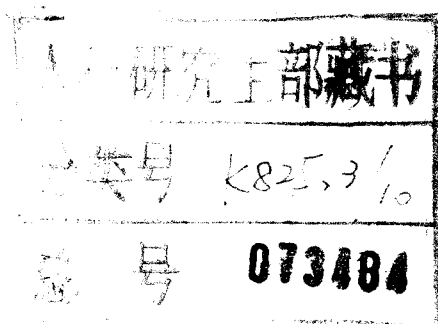
定价 28.00 元



073484

中国金融博导

梁伯枢 刘彪 等著



中国金融出版社

前 言

作为经济核心的金融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这一领域的专家——博士生导师,理所当然就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特殊群体。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他们的研究和参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不仅如此,由于肩负着下一代高级金融人才选拔和培养的使命,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我国下个世纪的金融业发展。对于这样一批人,把他们的经历、观点、成就以及他们对于学术和人生的追求,以一种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介绍给广大的读者,应该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的事情。

1996年3月,受人委托,我构思起草了两份材料,即《中国金融博导》一书的写作计划及采访提纲。基本目标有两个:(1)用特写(传记)或访谈形式介绍我国金融领域博士生导师的经历、观点、成就及教书育人的种种事迹,并以此为主线,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示我国现阶段金融博导的整体素质、治学方式、育人方式及拼搏精神;(2)用博士生小传的形式介绍金融博士生导师们所培养的门生——博士生简况。

在中国,每个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点须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组织专家审核遴选确定,各博士点每年的招生名额则由国家教育部控制,而博士生导师头衔在1995年以前均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统一授予,1995年以后才“权力下放”给各大学或科研机构。在实行非常严格的博士生导师制度的中国,只有那些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教授(研究员),才可以带博士生。这一点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很不相同,正如长期供职于美国丹佛大学的陈家盛教授所言,在美国“凡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师都可以被指定或接受学生要求而成为博士候选人的咨询人或顾问(Adviser),指导博士候选人的论文写作并组织论文答辩。”从这个角度讲,中国金融博导无疑都是我国金融教学与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代表者。正是基于这一原因,我们把《中国金融博导》这本书的英文译名定为 TOP FINANCE PROFESSORS IN CHINA。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金融博士生导师大致由三代人组成,第一代是在解放前接受的大学教育和专业培训,第二代多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自己培养出来的土生土长的学者,第三代则是在恢复高考后接受高等教育逐渐成长起来的。三代人各有特色,每一代人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因此,在书的写作计划中,提出了更高一层的目标,即通过一个个人物的介绍,同时展现:(1)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曲折艰难的历程;(2)不同时期出现的各种有代表性的思潮观点及所产生的影响;(3)曾经困扰中国经济金融的一些难题及学者们所采取的对策;(4)目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的一些问题及学者们所作的思考。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每篇文章拟设以下三大组块:(1)“博导档案”,简介博导职业、职位、成就,使读者在阅读正文之前对其经历先有一个简略的了解;(2)正文(访谈、自述、传记等),比较详细地介绍博导的人生经历、成就和理论观点;(3)“博士生资料”,简介博士生年龄、职业、研究方向、工作成就等。

写作计划及采访提纲确定之后,曾以《投资与合作》杂志社的名义打印成文向全国各地寄发。其他工作,比如作者、博士生导师

的名单确定及联络工作等等,均由《投资与合作》杂志社负责。1996年12月份,我正式接手全书组稿、统稿工作,负责写作或请人写作未写完的稿件,对来稿进行统一加工甚至重新编写,根据内容设定标题、栏目。1997年4月底,大部分经过第一轮加工的稿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秘书刘福寿先生,转呈给了戴相龙行长。

由于交通联络等客观条件限制,本书只收录了40位博士生导师(年长者排前、年轻者排后),最后确定的栏目有:“博导档案”、“博导小传”、“博导访谈”、“博导传记”、“博导自述”、“博导谈弟子”、“博导观点”、“博导观点与成就”、“博士生资料”等。其中多数文章成稿于1996年,绝大部分稿件在第二轮加工之后,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寄回给各位导师本人一一作了最终审核。40篇文章,我自己撰写9篇,《城市金融论坛》执行主编刘彪写了7篇,新华社原资深记者仲大军写了5篇,其余作者均为各地新闻单位记者及金融专业的博士生,他们是:刘强、方青、张合金、薛万祥、蒋少龙、方迎丰、刘军善、许祖华、华林、南木、赵德武、冯建、欧燕华、高盼、张俊、吴东蛟、张向达、王长元。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曾得到最早发起单位《投资与合作》杂志总编辑田涛先生的热心支持,刘强、高盼二位先生为书稿的写作联络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与此同时,中国银行的吴念鲁先生及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辑李守荣先生、副总编辑周战地先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责任编辑毛春明先生为本书的后期整理加工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中国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图书装帧设计专家林胜利先生为本书的封面作了精心设计,使本书增色不少。先后给予本书帮助的还有刘福寿、孙明春、王安、叶翔、唐旭、左传长、杨权、钮海燕等人及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单位。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尊敬的中国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最后为本书题写书名,这是我们长久的企盼,从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鼓励和鞭策。

梁伯枢

1998年6月5日于北京

陈彪如：开拓中国的国际金融学

文·方青

博导档案

陈彪如，男，1910年12月出生于湖北孝感。1929—1933年在清华大学攻读政治学。194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1946年回国后，先后在复旦大学、东吴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系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此外还担任过多种学术团体的负责人，如：中国国际金融学会顾问、中国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和上海分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上海世界经济学会名誉会长、美国经济学会顾问等。其传略曾入选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具有杰出贡献的世界名人》和美国传记研究所《500位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等辞典。

博导传记

发奋读书，寻找救国之路

陈彪如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经常给孩子们讲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以激励子女们奋发学习。这种情景在幼小的陈彪如头脑里深深地扎了根，对他以后的学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9岁那年，他进了一家私塾，在私塾先生的管教下，一本一本地背诵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等。私塾先生对学生学习的苛刻要求，使陈彪如受到了古典文学的熏陶，也使他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时隔80年，每当谈及幼时学习的情景，陈彪如还不禁流



露出对这位启蒙老师的怀念之情。

1924年,陈彪如到河南信阳上中学,两年后入北京汇文中学学习。在“科学救国论”的影响下,他对数理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不仅从数理化中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还学到了研究方法,这就是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严密的逻辑思维。1929年,陈彪如考取清华大学,决定在这座学术空气浓厚的高等学府里,攻读政治学。对

于选择这样一个专业,陈彪如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当时,国际上,在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下,弱肉强食,强国、大国任意欺压弱国、小国,战争不断,人类互相残杀。在国内,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凄惨景象随处可见。世界扰攘不安,国家多灾多难。陈彪如耳闻目睹国内外的政治状况,认识到要改变人类的命运,必须研究政治,政治不上轨道,一切都无从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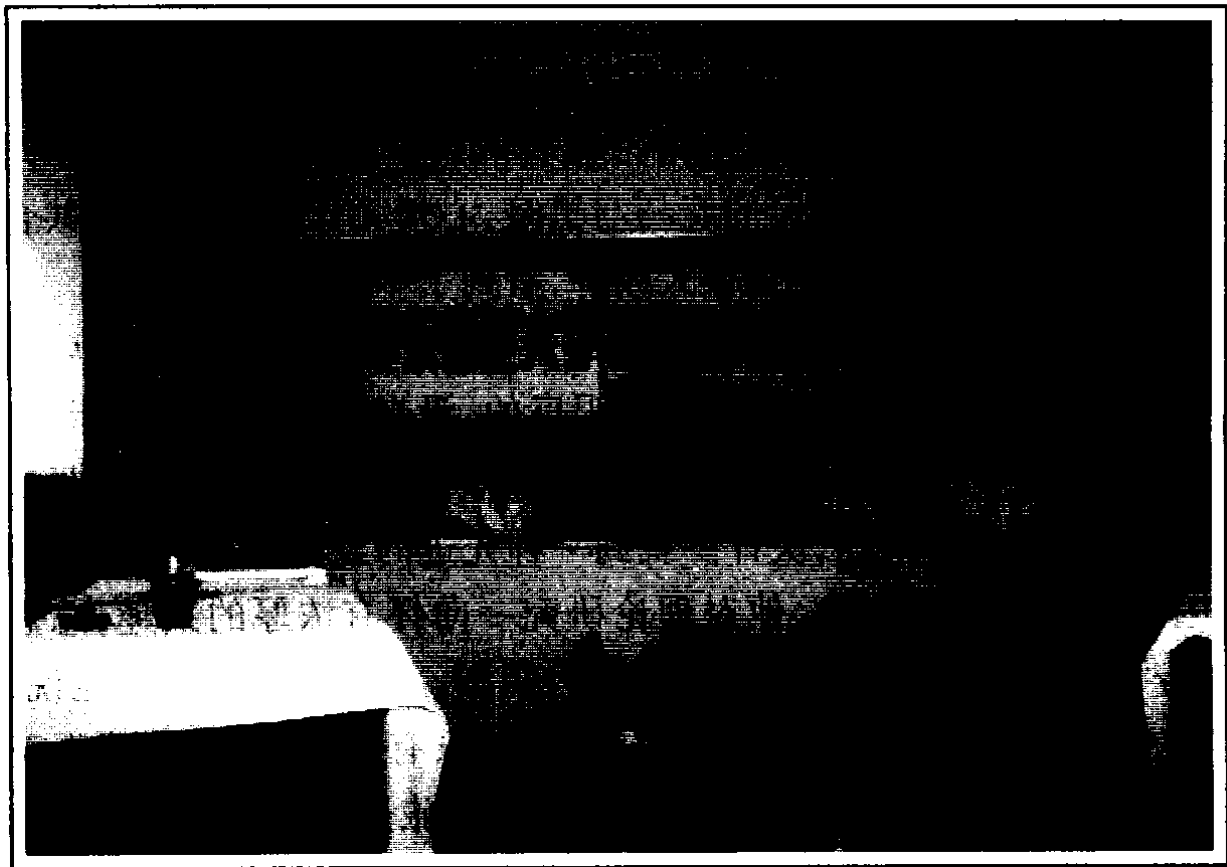
四年间他攻读了政治思想史、比较宪法、国际关系、国际公法等十几门政治学课程,还选修了一些经济学的课程。教授们认真负责的讲课,使陈彪如学到很多知识。这对他了解世界,了解资本主义,了解旧中国有很大帮助。1933年,陈彪如在清华大学毕业,

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过了一年多,由于家庭负担过重,他不得不辍学,走向社会。1937年,抗战爆发,他毅然投笔从戎,积极加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他从南京辗转入川,一路上看到日本军阀的凶狠残暴,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与黑暗,心情无比沉重。但国共合作,团结御侮,又使他受到很大鼓舞,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陈彪如看到国民经济因连年战争遭受严重破坏,深感战后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没有正确的理论为指导,根本无法改变千疮百痍的中国经济面貌。从这个时候起,陈彪如越来越注意经济问题,决计要找到一种先进的经济理论,作为改变中国经济状况的依据。他对理论研究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总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用自己的学识为祖国、人类做出贡献。他说,“每个人在世界上都只能作短暂的逗留,只有献身社会,才能真正理解短暂生命的意义。我要在短暂的生命旅途中,攀登科学高峰。这是一生中推动我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虽然在清华园内苦读四年,学习了政治学,但陈彪如仍以才疏学浅自谦,自忖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还需博采百家之长,吸取养料丰富自己。

留学美国,攻读西方经济学

1944年,陈彪如获得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机会,进了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哈佛大学是美国的最高学府,会集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如:熊彼得、汉森、哈勃勒和后来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里昂惕夫……。陈彪如毅然决定,在这座令人向往的学府里,跟从这些久享盛名的经济学大师,专心致志地学习和研究经济学,以寻找拯救中国经济的理论。陈彪如的这一重大决定,使他一举跻身经济学界,走上了研究经济学的道路。迄今,弹指已五十余载。然而,有谁知道,当陈彪如跨入经济学大门第一步时,他付出了多少艰辛,克服了多少困难啊!



首先,当时国内与国外在经济学研究上存在很大差距。在西方国家,凯恩斯理论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对经济进行宏观分析,一般都用图形和数学来进行论证;而国内学术界还停留在马歇尔经济学时代,与西方脱节,这就更加显得西方经济理论玄奥神秘,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其次,原来希望从课堂学习可以系统掌握经济学知识,可是这些大师都是著名教授学者,忙于著书立说,不愿花功夫备课,讲授时往往信口开河,谈些个人见解,没有章节,不成系统,学习遇到问题得靠自己苦思冥想,寻找答案。再次,哈佛大学特别注重学生自学和自己动手。这当然无可非议,大学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放在首位,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遇有问题,无人辅导,也增加了学习的困难。在近乎无师的情形下,陈彪如凭着中国人特有的坚韧不拔的毅力,“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勤学苦读,努力钻研。多少个周末,多少个星期天和休假日,他不去游玩,不肯休息,埋头在书斋。根据学校提供

的参考书目，他天天沉浸于图书馆里，聚精会神地一本一本研读。他很欣赏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科学研究好像钻木板，有人喜欢钻薄的，而我喜欢钻厚的。”他也很赞同宋人黄山谷“泛滥群书，不如精于一”的观点。书籍浩如烟海，再怎么争分夺秒，也不可能将所有参考书都从头读到尾。陈彪如采取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的方法。对名著，他采取精读的方法，反复阅读，仔细琢磨，掌握其精髓。对一般参考书，他采取泛读的方法，在广泛的浏览中，也常常收到“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效果。他既“破万卷”，又“攻一书”，使两种方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学业大有长进。

经过两年的发愤攻读，陈彪如掌握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当时西方经济学界正经历着新旧交替的过程，他对新旧两派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于所谓正统派经济学家，陈彪如感兴趣的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如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的适当配置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学应当研究的课题。同时陈彪如也感到惊讶，这些正统派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现实世界。他们通过对个别行业、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微观分析，竟然得出资本主义经济自动趋向于均衡，而且达到最适度的均衡的结论。他们把一种虚构的理论境界当作正常状态，理论完全与实际脱节。30年代以来所出现的大量失业和经济长期萧条的现象，他们竟熟视无睹，结果，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宣告破产。在陈彪如看来，凯恩斯比他的前辈要现实些，他承认危机和失业的存在，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有保持充分就业均衡的自然趋势，提出了一套阐述经济失调的理论。陈彪如后来回忆道，当时他对凯恩斯经济学只有两点粗浅的认识。第一，凯恩斯否定“萨伊定律”，论证资本主义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这种观点比较合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第二，凯恩斯的理论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出发点的，并不适用于经济落后的国家，所以它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问题。陈彪如感到苦闷，因为他攻读经济学的动机，是探索经济治国的道路，而

废寝忘食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要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寻找解决的答案,是找不到的。

1946年底,陈彪如在哈佛大学读完硕士学位,毅然回国,被聘为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不久兼任经济系主任。陈彪如以为,在学校教书,可以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了。他准备双管齐下,一方面翻译几本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代表作,同时写一些译介的文章和书籍,使国内学术界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他打算在评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陈彪如抱着一个热烈而单纯的愿望,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可是事与愿违。当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形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涨。陈彪如不得不为生活操心,无法静下心来开展研究工作。他的幻想破灭了。他开始认识到,没有一个健全的政治制度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科学文化是很难发展的。陈彪如的理想,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变成现实。

专心研究,译介西方经济学名著

解放后,暨南大学撤销,陈彪如先后在复旦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任教,担任经济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转入华东师范大学,主要讲授政治经济学。陈彪如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就着手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他先后写了两本书——《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批判》(1957年)和《什么是凯恩斯主义》(1960年)。《什么是凯恩斯主义》迄今已出了三版,1975年一位日本学者将它译成日文,日本学者称这本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凯恩斯主义的一本书,是中国出版的有关凯恩斯文献中最详细的一本。陈彪如教授在这本书的“凯恩斯主义与战后美国经济”一节中指出,美国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花费的政策,加剧

了通货膨胀的威胁。他写道：“人人都清楚，今天美国的通货膨胀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而且还要继续发展下去，从缓慢的通货膨胀变成快马加鞭式的通货膨胀。”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论断。

由于“左”的思想作祟，长时期来，我们对资产阶级的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陈彪如认为，在文化斗争中，也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而不殆，不能采取简单否定的方式对待资产阶级的理论，而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理论作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以扩大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理论。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经济学界对国外经济学说的最新发展知之甚少，几乎处于隔绝状态，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陈彪如计划将自己掌握的资料介绍给国内学术界，他准备写一二本专著，评述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但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学术界动荡不宁，写书非常困难，陈彪如只得以翻译名著的形式向我国经济学界介绍西方经济思想。他翻译了英国经济学家米克的《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这是作者经过长期研究和艰苦探索写出的一部专著。这本书对我们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价值学说的深刻内容，加强对资产阶级各种庸俗价值理论的批判，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陈彪如凭借他深厚的英语根底、精湛的语言表达技巧和广博的经济学知识，以坚强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刻苦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译著。即使在最艰难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没有完全停止。他总共翻译出版了9本当代西方经济学代表作，共计270万字，陈彪如不遗余力地将一些西方经济学名著翻译出版，无疑为我国经济学界积累了一批宝贵的财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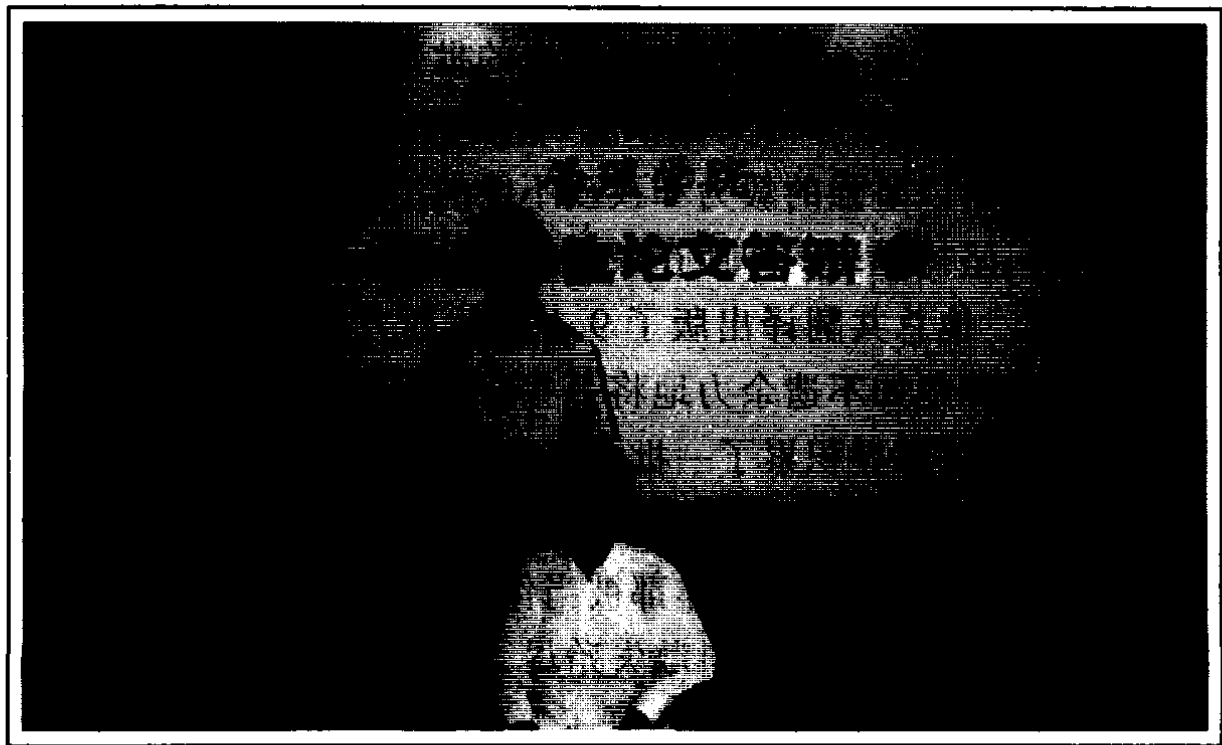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中，陈彪如同其他卓有成就的教授学者一样，受到冲击和迫害。他的所有译作都被当作毒草进行批判，家被抄了，著述权利被剥夺了，文稿资料散失殆尽，整个研究计划全部成了泡影。粉碎“四人帮”后，陈彪如恢复了工作。严冬已过，枯木逢春，

他没有气馁,没有丧失信心,只是感到浪费了十年宝贵的时间,实在太可惜。他振作精神,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工作的重点已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形势的发展,需要理论工作者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冷静思考,开拓国际金融研究

陈彪如一贯倡导,理论研究要与实践相结合,理论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形势下,陈彪如决定加紧对国际金融的研究,以尽快开拓这一新兴学科。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国际金融与“四化”建设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其次,国际金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应尽快填补这块空白。

陈彪如是我国较早建议开展国际金融研究的倡导者之一。早在 60 年代,国际金融学作为一门研究学科在国外刚刚兴起不久,他就接受有关部门的委托,着手编写世界经济教材中国际金融部



分,只是由于十年动乱这项工作才不得不中断。粉碎“四人帮”后,陈彪如选择了国际货币制度这个核心问题作为开拓国际金融学科的突破口,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发表了《当前国际货币制度问题》、《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危机》、《国际储备体系的最新发展》等7篇论文。陈彪如的这些论文阐述了对国际货币制度的观点,形成了他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见解,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较大反响。他认为,在进入80年代时,国际货币体系将面临一系列困难的挑战,如汇率的剧烈波动,国际储备的多样化,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调和国际债务危机的发展等,这就迫切要求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加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国际合作,建立一种公正的国际货币关系和一种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现在,由于黄金不足,必须寻找一种集体创造的储备货币作为黄金的补充,使世界货币的实体与形式统一起来。这样一种货币体系,就可以在国际控制下,保证国际储备的适当增长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与发展。1983年,陈彪如发表在上海市社联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论文集上的《从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看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一文,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国际货币问题的结晶。文章以货币的本质和形态的辩证统一关系,分析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提出“特别提款权与黄金挂钩,实行一种新型的金本位制,重新建立比较稳定的货币体系”的观点,这体现了陈彪如在理论上的坚定性和学术上的创造精神。该文获得上海市社联颁发的优秀学术成果奖。陈彪如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论述,在我国国际金融学科中具有重要地位,为他具有特色的、完整的国际金融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陈彪如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对研究工作始终保持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从不随意附和某种观点,即使这种观点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他对国际金融每一种经济现象都要深入分析,冷静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见解往往因逻辑性强,富有独到性和启发意义,而引起国际金融界同行的重视。1981年3月,在杭州国际